

近代日本 亚太政策的演变

臧运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近代日本 亚太政策的演变

臧运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臧运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
(博雅史学论丛·中国史系列)
ISBN 978-7-301-15047-4

I. 近… II. 臧… III. ①日本-对外政策-亚太地区-1868~1945②日本-对外关系-亚太地区-1868~1945 IV. D8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2600号

书 名: 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

著作责任者: 臧运祜 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047-4/K·058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4.25印张 360千字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本书主要以十五年战争时期(1931—1945年)为中心,研究近代日本(1868—1945年)从大陆政策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亚太政策的演变过程。在此,拟就与本课题相关的若干术语、中日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以及笔者的研究设想,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作为历史用语的“大陆政策”与“大东亚共荣圈”

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曾长期被一般地概括为“大陆政策”;1940年以后,又一度被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大陆政策”与“大东亚共荣圈”,虽非学术用语、而是历史用语^①,可以被作为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代名词。但是,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仍然还以“大陆政策”与“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历史用语”来概括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在学术上则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① 中国学者早在1930年对于日本“满蒙政策”的研究中,就指出:“满蒙问题者,一般习用之名词,而非学术上之用语也。满蒙问题实为满洲问题;满洲又非我国固有名称,则直称之为东三省问题可耳。本书所以用满蒙问题名者,从一般之习惯,而非从学术上之命名也。”(朱偕编:《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页“所谓满蒙问题”)。战后,中国台湾学者梁敬簪也指出:日本大陆政策已成为“历史名词”(梁敬簪:《日本大陆政策的成长与变质》,见氏著《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7—142页)。也有的日本学者把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称作“历史用语”,而非“学术用语”(千叶功:《小林道彦著〈日本の大陆政策1895—1914——桂太郎と后藤新平〉》,《史学杂志》第106编第8号,1997年11月)。笔者借用上述说法,以“历史用语”与“学术用语”从论。

首先,就“大陆政策”而言。(1)从历史内涵来看,它是指近代日本对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大陆的侵略政策。但是,除中国大陆(包括“满洲”、内外蒙古)之外,它还应当包括朝鲜半岛、西伯利亚东部等地区,这在近代日本历史上又被称为“北进政策”。此外,近代日本同时进行的对于中国华南地区与华南沿海的台湾岛、海南岛及南海诸岛,以及被称为“内南洋”即赤道以北的原德国所属南洋群岛、被称为“外南洋”即当今的东南亚地区的“海洋政策”,即所谓“南进政策”,则没有被包括在内。因此,“大陆政策”显然难以全面概括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内容。(2)从历史发展来看,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形成于1890年代之后,又有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①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对于中国人而言,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通俗用语,但是笔者曾遍查各种大陆的中文辞书,竟找不到一个可以认可的解释。倒是在一本最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却有一个虽然不确、但是通俗的对于“大陆政策”的注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统治集团制定的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侵略政策。”^②在台湾地区的一般中文工具书中,也未尝发现此一词目。^③日本的近代史与外交史辞典,也几乎没有专门的“大陆政策”词条。^④而在日本政府或军部的公文书中,或者称“满蒙政策”或者称“对华政策”,近代以来一直没有正式使用“大陆政策”这个用语,直到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决定的《国策基准》文件中,才第一次正

① 关于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问题,中、日学界均有不同的看法,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此外,中国学界近年还有以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为标志而称日本的“新大陆政策”者(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第一卷“从九一八到七七”,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张海鹏:《(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编:《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页),笔者对此说存疑。

②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中国近代现代史》(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下册,第1页,注释①。

③ 陈丰祥:《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台北,金禾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自序”。

④ 京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编:《日本近代史辞典》,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3年6月第11刷;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外交史辞典编纂委员会:《新版日本外交史辞典》,东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竹内理三等编,沈仁安、马斌等译:《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式使用了“大陆政策”这个用语。^①日本不久发动“中国事变”并于1940年底基本实现了“大陆政策”之后,随着“中国事变”不久被纳入“大东亚战争”,其大陆政策也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范畴。因此,“大陆政策”难以全面反映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全过程。综上所述,从学术规范而言,尽管“大陆政策”是近代日本长期奉行的对外政策,并可以构成其主体部分,但它本身并不能替代和反映对外政策的全部,故“大陆政策”仍应被视作一个“历史用语”,而并非一个“学术用语”。

其次,就“大东亚共荣圈”而言。“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确立于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不久;1941年12月东条内阁发动“大东亚战争”之后,亦把它作为战时日本的最高国策,直到日本战败投降。^②作为一个历史用语,较之于“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无论就政策的内容本身,还是在实施政策的地区与范围、对象与手段等方面,无疑可以更好地概括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但是由于:第一,该政策的目标虽然美其名曰“共荣圈”,但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它是地道的“共贫圈”,“只不过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企图的一种粉饰”^③,而足以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本本质。第二,战后随着“大东亚战争”称呼的被废止,正如中国学者所指出,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④。因此,如同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有产物一样,“大东亚共荣圈”也只能作为一个“历史用语”,而不可能被用作“学术用语”。

(二)作为学术用语的“亚太政策”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今天使用“亚太政策”一词来概括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比较合适。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
-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第一卷(满洲事变前夜),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第6—7页及第441页之第一章“二 大陆政策与门户开放政策”之注释3。日本学者的这个观点,也有中国学者接受(周颂伦:《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第151页)。
 - ② 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之一。
 - ③ 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下册,第682、687页。
 - ④ 赵建民:《“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

1. 始于1970年代中期、盛于1990年代,当今已为学界所习惯使用的“亚太”(Asian—Pacific)概念,既属于当年日本所谓的“大东亚”(Great Asian)地区,又是今日学界一般所指的“大东亚”。^①“亚太”从地理范围上涵盖了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整个范围,它比“大陆政策”的地理范围更为合乎史实,也比“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历史用语更为合乎学术规范。因此,它足以作为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学术代名词。

2. 近代日本不同于欧美国家,亚太政策始终是其对外政策的几乎全部内容。东条英机在发动“大东亚战争”时就宣称:“帝国的外交之中,有关大东亚圈者占九成。”^②从明治初年到1945年以前,近代日本人在海外活动的所有地区,按照日本大藏省管理局1950年编《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一书所载,主要包括朝鲜、台湾、桦太(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南部——笔者)、南洋群岛、满洲、华北、华中华南、海南岛、南方等地区;它包括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所有地区,即“被日本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占领地化的亚洲地区”^③。这些地区,也就是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范围。

3. 关于1931—1945年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日本虽然曾在1941年12月以国策的名义定名为“大东亚战争”,战败后又在美国的影响下改称为“太平洋战争”^④,但是其“战争”的时限仅为1940年代前期,即使包括“中国事变”在内,也仅开始于1937年7月。针对这种战前的“官方”定义,战后日本史学界自1956年起就提出了“十五年战争”(1931—1945年)的称呼,并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日本学界得以普及,现今已成为日本学术界

① 中国学者关于当今“亚太”概念的形成过程及有关该概念的考证与辨析,参考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7页。关于日本当年确定的“大东亚”的范围,请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关于当今学界所称“大东亚”,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7页。

② 东条英机1942年10月的发言。转引自矢野畅:《“南进”の系谱》,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第164页。

③ 大藏省管理局编:《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関する历史的調査》,东京,1950年版,缩微胶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井村哲郎编:《1940年代の东亚》,东京,アジア经济研究所,1997年,“文献解題”,第295—298页。

④ 日本海军方面当年在定名为“大东亚战争”时,也曾主张称之为“太平洋战争”。参见太田弘毅:《大东亚战争の呼称について》,《军事史学》第13卷第3号,1977年12月。

普遍接受的观点。^①关于“十五年战争”的名称之定性,也有日本学者提出不使用“太平洋战争”,而使用“亚洲—太平洋战争”或“亚洲·太平洋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称呼^②,因此,近年来,以“亚洲太平洋战争”(“アジア太平洋战争”)为主题的史学著作,在日本亦屡见不鲜。^③总之,日本史学界“十五年亚太战争”的提法,凸现了从学术上研究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必要性和意义,也是本书立论的现实学术借鉴。

二

(一)

中国学界关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研究,长期以来分别是在日本的对华政策、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这三个层次上进行研究的,而以日本对华政策为重点;只是在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了一些总论性的著作。

由于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的主题是日本侵华史,因此,在1949年以前和以后,中国史学界关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重点一直是日本侵华,并在20世纪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堪称这方面的一部承先启后的最重要的代表作。^⑤大陆学界自1980年代中期方兴未艾的日本侵华

① 参考木坂顺一郎:《关于十五年战争的性质及称谓问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70—87页;杨栋梁:《江口圭一与十五年侵略战争史研究》,杨栋梁主编:《日本进步史学家江口圭一》,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317页。

② 副岛昭一:《日中戦争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历史科学》第102号,1985年;《“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そのあと》,《近きに在りて》第20号,1991年。木坂顺一郎:《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呼称と性格》,《龙谷法学》第25卷4号,1993年。

③ 例如,吉田裕:《アジア太平洋戦争》,岩波书店,2007年;佐藤元英编:《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期政策決定文書》,原书房,2001年。

④ 徐勇:《日本侵华史研究综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张振鹄:《日本侵华史研究:一个粗略的回顾》,《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李玉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2—28页。

⑤ 俞辛焞、祁建民:《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最新重要成果》,《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张振鹄先生为该书写作的序言,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史研究中,除了越来越多的若干史实性的成果之外,关于日本侵华政策的研究,也是中国学者的一大成果。除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政策的大量论文^①之外,有关著作作为下列六种:(1)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主要依据日本的《战史丛书》等军事资料,重点研究了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侵华的战略及其演变过程。尽管该书出版后中国学界评判不一^②,但是作者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专门论述,毕竟弥补了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在研究战争问题上“书生谈兵”式的薄弱环节。(2)邢丽雅、周彦著《近代日本侵华政策演变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依据一般性的史料,概述了近代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但在史料的运用与论述的深度上,仍有较大的欠缺。(3)拙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的外交资料,论述了从九一八到七七期间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但在宏观与整体上的考察比较薄弱。(4)刘天纯等著《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集体作品,作者将近代日本对华政策视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部分,因而在该书之第二部分“近代时期对华政策”中,围绕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论述了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但是因为该部分并非该书的重点内容,加之论述上缺乏历史学的特点,因此全书对于近代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过于简略。(5)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也主要依据日方史料,研究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从“东亚新秩序论”到“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决策过程;但美中不足的是对于日本侵华政策的研究反而较少,而对于“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研究尚需深入。(6)关捷主编《日本侵华政策与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系作者主编的“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二”,书中分别由有关作者分工,一般性地论述了日本的东方会议以及近70年间的侵华政策演变,并介绍了日本实施侵华政策的机构(军部、关东军、满铁、特务、石家庄战俘劳工集中营);把侵华政策的实施机构进行专门介绍,这是本书的特

① 肖立辉、孟令梅:《我国学者对日本侵华政策的研究综述》,《日本学刊》1999年第5期。丁则勤教授堪称这方面的专家;他的有关论文,参见《丁则勤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② 曲家源:《评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李吉奎《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评介》,《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色,但是对于日本侵华政策本身的研究仍需深化。由上可见,中国作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最早与最大的受害国,对于日本侵华史及其侵华政策的继续深入研究,不但是深化中国抗日战争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的必需^①,也必将推动和加深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史的研究。

与上述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密切相关,中国学界关于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早在20世纪30年代,鉴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的国难日亟,中国学者就开始探讨日本的大陆政策,并产生过若干的论著。^② 这些成果尽管比较初级和粗糙,但是无疑奠定了中国的学术基础研究。遗憾的是,这种学术研究此后并没有被很好地延续下去。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学界才重新开始发表有关论文,并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田中奏折”问题,一度形成过大陆政策研究上的高潮。^③ 上述有关论文之外,在著作方面,大陆学者易显石著《日本の大陆政策と中国东北》(东京,六兴出版,1989年6月)和台湾学者陈丰祥著《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12月),堪称为中国学界在20世纪后期的代表作。前者为“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丛书之一,作者在此前研究九一八事变的基础上(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围绕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论述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满蒙”)的侵略过程;后者系“国际视野丛书之四”,作者在此前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基础上,论述了从幕末以来到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以满洲为中心的大陆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将其演变过程分为五个时期(第7章“结论”第329—332页)。上述两书的共同特点是结合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满洲”)的侵略历史,论述了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演变过程。这虽然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

① 有关专家的见解,参见《抗日战争史研究如何深入(笔谈)》,《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2期;《抗日战争研究:历史学的使命(笔谈)》,《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② 按出版时间为序,主要有下列:张树人:《日本大陆政策解剖》,上海,最近之日本周刊社,1931年;胡鸣龙:《日本大陆侵略政策》(日本研究小丛书),南京,日本评论社,1934年5月;蒋震华:《日本之东亚门罗主义》(日本研究小丛书),南京,日本评论社,1933年11月;柳乃夫:《日本大陆政策》,上海,黑白书社,1937年3月;国难资料编辑社编:《日本大陆政策的真面目》(国难丛刊资料之一),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7月;敬幼如编:《敌人大陆政策之原形》(祖国丛书),重庆,中国编译出版社,1940年。

③ 李玉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第178—191页。

界的研究传统,但缺陷仍然在于对此后的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与全面实施缺乏应有的论述。有鉴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研究上的一度沉寂状况和上述研究上的缺陷,21世纪以来,2004年初的《江海学刊》杂志发表了一组论文,在继续深化有关大陆政策研究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对于抗战时期日本大陆政策的有关研究,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大陆政策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台湾的实施及其危害,“以期引起中日学界的关注”。^①目前除了有关论文之外^②,最新的代表作为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作者在从事前述《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有关部分著述的基础上,以洋洋近70万言,全面论述了包括十五年战争时期在内的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演变过程,弥补了中国学界长期的上述研究缺陷。他还分别以1870年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论”、1927年田中义一首相的“满蒙分离论”、1937年近卫文麿首相的“国际正义论”和1942年东条英机首相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论”作为标志,将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前言”第4页),这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研究成果的创见。但是,由于作者的优势在于日本侵华史,故对于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内容上的叙述基本上限于中国。这固然凸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主体和核心,但毕竟没有完全反映作者所定义的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陆政策的真相,因而不得不成为中国学界迄今为止的研究缺憾。

除了上述着眼于日本侵华政策、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研究之外,中国学界对于全面意义上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研究,乃是在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之后。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中国学界对于“大东亚共荣圈”,无论在战时乃至战后,研究的侧重点一直是负面的批判和揭露,真正理性的学术研究成果甚少。^③此外,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与太平洋战争史的研究中,部分学者还论述了日本的南进政策或战略

① 《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研究”系列论文及其“编者按”。

② 关于近十年来中国学界的有关论文情况,参见李东华:《近年学术界关于日本“大陆政策”研究综述》,《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

③ 李玉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以及宋成有《日本史研究综述》(《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几乎没有提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另参考赵文亮:《二战研究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的有关论著。

以及它与北进战略的关系;其中也有学者指出了日本近代以来的南进政策之演变过程。^①另外,我国台湾地区的部分学者,也一贯从日本的侵台、割台事件与日台关系出发,而关注并研究近代日本的南进政策。^②此外,最近还有些中国学者,就与此问题有关的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或“大亚洲主义”问题,展开了研究,并进行了争论。^③除了上述论文和相关研究之外,关于“太平洋战争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当推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这是中国学者以日本为主要对象,关于太平洋战争及其相关问题的新论。关于“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学者最近的著作有:(1)林庆元、杨齐福著《“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该书从思想、主义、理论等方面,系统、全面地剖析了近代日本产生“大东亚共荣圈”的来源及其发展流向,惟其对于政策层面的研究甚为欠缺。(2)柳茂坤、钟庆安著《“大东亚共荣圈”之梦》(海南出版社,2006年),该书作为“太平洋战争史话之一”,形象而生动地论述了近代日本从明治维新走向“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过程,但惟因其作为“史话”作品,学术性则嫌不足。以上两书,因侧重于演变过程的“前史”叙述,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论述仍然薄弱(前书)或缺如(后书)。

在以上几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界最近也出现了综合研究近代日本亚太政策演变的著作。主要有:(1)由于近代日本对亚太地区的一系列侵略扩张,与其“日本军国主义”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自1999年起专门成立了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日本军国主义史”课题组,并就

① 参见李玉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第231—237页;赵文亮:《二战研究在中国》,第507—509页之论文目录。

② 梁华璜:《近代日本南进的序幕——中日战争与割让台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7—644页;方秋韦:《日本大陆政策的南进政策》,《日本评论》十三卷第七期(台北)。卞凤奎先生2001年在厦门大学申请历史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台湾总督府的华南与南洋拓进政策——以籍民为中心》。

③ 参考王屏:《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戚其章:《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近代日本的内外政策”，主办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①它意味着，曾经仅仅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终将纳入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学术视野而进行重新审视。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就是该课题的阶段成果。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研究丛书”之一，对于1853—1945年日本近代史上的军国主义问题，按照“导论”、“源流要素”、“体制政策”、“侵略扩张”四个部分，分别从理论、政策、史实等方面，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它既是中国学界相关研究的综述，又是对于有关成果的提升，标志着中国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但稍显不足的是：在历史问题的叙述方法上，仍然缺乏第一手资料的运用和征引；流于面面俱到的论述，加之作者队伍的参差不齐，则难免无懈可击之处，比如缺乏第一手资料作支撑的“政策”研究上的薄弱（第八章）等。（2）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年），作者认为近代日本对外关系的主线是自明治初年形成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他将近代日本政府层面的东亚战略和政策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1868—1879、1878—1910、1911—1933、1933—1945），以日本的外交文献为主，分别进行了论述。这是中国学者迄今关于近代日本东亚乃至“大东亚”政策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但是，由于作者本人的专长在于日本“近代”（1918年以前）外交史（《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故该书除了对于前近代、明治时代的研究较为充分外，对于十五年战争期间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熊沛彪著《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则重点研究自九一八事变到“大东亚战争”之前日本对于东亚地区的霸权战略，部分地弥补了上书的缺陷。但是，以上两书仅限于“东亚”地区的研究以及主要对于“战略”问题的关注，必然忽视了近代日本对于亚太（“大东亚”）地区以政略为主的政策方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中国学界主要集中于日本侵华政策、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以及二战时期的南进政策与“大东亚共荣圈”这三个领域的研究，迄今已经分别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近年来又开始更为宏观地探讨近代日本的东亚政策，

① 胡澎：《“近代日本内外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日本学刊》2001年第5期。200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近代日本内外政策”国际学术讨论会，见：<http://www.ijcs.cn>。

并整体地研讨与上述所有领域都有关的日本军国主义等重大问题。但笔者在肯定上述成就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指出:上述成果还只是阶段性、片段性的,分布不均、且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对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特别是十五年战争期间的亚太政策,迄今仍然缺乏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果。^①从史学史的研究角度分析,出现上述不足情况的客观原因,如同有学者所指出的,战后中国史学界在二次大战史研究中,受到了欧美史学和苏联史学的双重影响,^②从而部分地导致了对于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重视不够,以及对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史的忽略。

在指摘上述研究不足的同时,还需要补充说明两点:一是早在1928年,戴季陶著《日本论》就指出近代日本存在着“北进”、“南进”两项对外政策,即“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③20世纪30年代初,蒋坚忍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明显地吸取了戴氏的上述见解,也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有“大陆进取政策”与“海洋进取政策”。^④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全面实施大陆政策、发动侵华战争之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于1936、1938年指出了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⑤;蒋介石也于1938年指出了日本的大陆北进政策、南进海洋政策。^⑥1941年12月9日,

① 拙文《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与特征》(《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系笔者在本书之前的初步研究。该文又被收入胡春惠、宋成有主编《东北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2003年,第345—358页),并被摘要发表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2期(第179页)。

② 徐勇:《论日本在二战中的北、南进战略选择》,《北大史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③ 戴季陶:《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第十七章。

④ 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7月出版、1932年11月五版,第二章,第26—28页。

⑤ 毛泽东1936年7月16日在延安告诉美国记者斯诺先生:“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2页)毛泽东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时,又抄录了他的上述谈话,并再次指出:“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443—444、509页)

⑥ 蒋介石1938年12月26日发表斥责“近卫声明”讲话称:“日本的政策,现在是已由他的大陆政策扩充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进政策改进到南进政策,简言之,日本现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陆与海洋同时并进,双管齐下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中国政府发表的《对日宣战文》，也指出：“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①这说明战前中国的知识界和领导人对于近代日本既定的对外政策有着比较明确而清晰的认识，它无疑应该成为我们在战后继续研究的出发点。

二是早在 1920 年代初因为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而兴起的“太平洋问题研究热”当中，已经有中国学者论述日本与太平洋问题的关系及其太平洋政策。^②而在 1980 年代再次兴起的“太平洋热”中，中国学者也注意到近代日本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历史作用^③，还有学者在关注现实的日本与亚太关系时，追溯了近代以来日本与亚太的关系。^④更有学者注意研究亚太地区历时 15 年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史。^⑤在上述基础上，2005 年 9 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中国学术界不但正式明确了“十四年抗日战争史”的见解，^⑥并认识到在学术研究上应该将中国抗战史与日本侵略亚太地区各国的历史联系起来。^⑦中国学界的这些先行研究和最新见解，无疑为本书进一步研究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史，奠定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① 祖国社编：《抗战以来中国外交重要文献》，重庆，1943 年，第 71 页。

② 参考葛绥成：《太平洋问题的解剖》，上海，中华书局，1933 年；时逸之：《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天津，1936 年。

③ 何芳川：《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米庆余、王晓德主编：《近现代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④ 孙承主编：《日本与亚太——世纪之交的分析与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引言”。

⑤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1931 年—1945 年）》，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该书第一章略述了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史。

⑥ 19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界主要是东北地区的学者提出了中日 15 年战争史的见解（参见王维礼：《中日 15 年战争及其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并产生了一些十四年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最新的代表作为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但尽管如此，直到 2005 年，中国学界仍然还有不同的看法。相关争论参见：张振鹄《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笔者虽同意从日本侵华战争史上可称为“十五年战争史”，但是坚持中国八年抗战的史观（臧运祜：《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⑦ 2005 年 9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日本侵略亚太各国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人民日报》2005 年 9 月 5 日第二版。

(二)

战前的日本,还在发动侵华战争和“大东亚战争”期间,就有关于“大陆政策”及“大东亚政策”的所谓研究^①。战前日本史学界关于亚太政策史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东洋史学”的范围(后来又发展到“大东亚史”)。这些主要由官方机构把持进行的所谓研究,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亚太地区不断扩张的侵略政策,带有相当浓厚的“御用史学”色彩。^②战后,有的日本学者在总结战前东洋史学研究的错误时指出:“明治以降,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发展,实与日本帝国主义相表里。换言之,即与侵略主义紧密结合。”^③中国学者最近的研究也指出,近现代日本的“中国学”,总体上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沦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④;在关于中国研究的“汉学”上,1931—1945年的日本,“在汉学研究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为军国主义政策服务的色彩”^⑤。中国学界近年来对于近代日本学人与其侵华国策的“瓜葛”现象的关注^⑥,说明对于战前日本的有关所谓研究,必须审慎看待,并认清其本质。^⑦

-
- ① 日本的大阪朝日新闻社调查部于1939—1941年间编集了《大陆政策に関する文献书目并解说》第1—24辑;朝日新闻社大阪本社调查部于1942—1944年间编集了《大东亚政策に関する文献书目并解说》第28—46辑。以上参见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昭和前期刊行图书电子版集成。片仓穰编《日本アジア关系史研究文献目录》(单行书篇)(东京:多贺出版,1996年)之“战前编”(近现代の部),就收录了大量有关上述政策的日本文献书目。
- ② 参考严绍璦:《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之第十章。
- ③ 日本“东洋学文献连络会”1965年7月的会议发言(在东洋文化研究所举行)。李毓澍:《日本东京有关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收藏及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概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期,台北,1969年。
- ④ 龚咏梅:《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 ⑤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82页。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也注意到了日本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这一点;她指出: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是他的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是和一个明显具有殖民色彩的对华设想联系在一起的”;宫崎市定继承内藤湖南的学说发展而成的“中国文明停滞论”,在日本大举侵略邻国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难免不沦为与侵略战争共呼吸的所谓学术论调。”(同上书,第240—243页)
- ⑥ 刘岳兵:《正视日本学人与国策的“瓜葛”——读〈像日本人那样做学问〉有感》,《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29日。
- ⑦ 依笔者看来,日本战前在这方面的先行研究,至今尚有学术参考价值者,例如东亚研究所刊行的《日本大陆政策的发展》(角田顺担当,1940年12月),以及战后出版的植田捷雄著《日华交涉史——日本的大陆发展とその崩坏过程》(野村书店,1948年7月)、橘朴著《大陆政策批判》(劲草书房,1966年)等。

战后 60 多年来,日本史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者们在研究日本近代史特别是日本外交史、近代日中关系史的基础上,对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主要内容,无论是大陆政策、南进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还是对华政策,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① 这些成果为我们中国学者研究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无疑可以提供很大的方便和借鉴。但是还应该指出:由于日本学者的各项研究一般是独立进行的,至今我们还难以看到能够将日本的大陆政策、南进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有机的结合,即从近代亚太政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多的学术成果。

此外,如上所述,由于“十五年亚太战争史”的称呼已在日本逐步得到普及,学者们关于亚太战争史的继续深入研究^②,必将有利于开展对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史的研究。而且,由于日本学术界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掀起了 20 世纪的第二次“太平洋热”,而“21 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或太平洋时代”的呼声,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际学术界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③,因此可以预料,随着 21 世纪“亚太时代”的现实需要,重新审视近代日

① 中村隆英、伊藤隆编《近代日本研究入门》(增补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 年),介绍过有关的研究情况。片仓穰编《日本アジア关系史研究文献目录》(单行书篇)之“战后编”(近现代の部),收录了战后大量的有关文献书目;龙溪书社 2001 年开始复刊的《20 世纪日本のアジア关系重要研究资料》,系战前出版的有关日本与亚洲关系的主要研究资料的复制。山根幸夫等编《增补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入门》(研文出版,1996 年),对于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日中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大陆政策”之研究状况,已作了全面的介绍。石井正敏、川越泰博编《日中、日朝关系研究文献目录》(增补改订版,国书刊行会,1996 年)收录了关于日中、日朝关系的研究文献。山本有造、盛田良治编《近代日本の南方关与》に關する战后日本刊行文献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9 年),则收录了日本战后关于近代日本的南进及其政策的研究文献;松浦正孝编著《昭和・アジア主义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ミネルヴァ书房,2007 年),收录了最近日本学者关于昭和时代“南进”的最新研究。此外,在日本的主要学术网站上,如果以“大陆政策”、“南进政策”(或“南进”)、“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对华政策等作为“关键词”,进行随意检索的话,将可以随时浏览有关的研究成果。

② 日本学术界战后对于亚太战争史研究的代表作,当推《太平洋战争への道》第 1—7 卷(朝日新闻社,1963 年)、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4)“大东亚战争への道”(南窗社,1982 年)等。1990 年代以前的其他情况,参考陈文寿译:《亚洲太平洋战争研究引论》(上)、(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1990 年版、第二辑,北京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992 年。日本学界的研究介绍,参见细谷千博:《太平洋战争史研究の历史的展开について》,《外交史料馆报》第 8 号,1995 年 3 月。

③ 何芳川:《太平洋时代和中国》,《北京大学学报》1995 年第 3 期。